

读有所得



王春林

叙述的洪流与主体羸弱

李亚的《花好月圆》毫无疑问是一部在叙述形式上进行过煞费苦心设计的长篇小说。在这部作品中,作家李亚采用了可謂是双重叠加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第一重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名叫小帮助,是一位图书仓库的管理员。小帮助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一重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与他父亲的一部书稿紧密相关:“我不是凭空而来的,我是从父亲的稿子里钻出来的。”而父亲的书稿,则是由父亲一手记录并整理完成的“我”大爷爷李娃的人生回忆录。

需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一点,其实是“我”父亲在撰写这部大爷爷的回忆录时所持有的一种价值观念:“一切就像我父亲自己所说的那样,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和大历史的进展是紧密相连的,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是个人物就自暴自弃,不关心国家大事,不关心历史进程,事实上自古以来,王朝的兴盛与衰败,都与咱们这些小人物息息相关。”李亚创作《花好月圆》这部历史长篇小说的根本意图,恐怕就是要借助于李娃这样一位极不起眼的小人物的人生故事来折射映现一段历史的风云变幻。

尽管作为一部历史长篇小说,《花好月圆》记述了诸多相关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细节,但说实在话,这些事件和细节在阅读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被这股叙述洪流淹没的感觉。又或者,对如此一种直就是在席卷一切的叙述洪流的营造,本就是作家李亚试图企及的艺术目标之一。就此而言,李亚在《花好月圆》中所精心营造出的这一股叙述洪流,完全可以被理解为巨大历史合流的一种象征隐喻式表达,他意欲传达给广大读者的,一方面固然是那笼罩一切的历史宿命感,但另一方面却更是巨大历史洪流面前个人主体性的羸弱与无助。

尽管《花好月圆》的叙述时间跨度前后长达差不多一个世纪,但大爷爷李娃所重点讲述的,也不过是从他15岁那年也即公元1934年无意间进入上海滩起始,一直到1949年15年间的故事。这十五年又可以被切割为不同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李娃踏入上海开始,一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他被方家安排从军为止。第二个阶段,从李娃从军进入祝长官的司令部任职起始,一直到所谓“皖南事变”的发生为止。自打“皖南事变”之后,李娃便随同大小姐加入到了新四军的行列之中。从这个时候起始,一直到1949年的大约七八年时间,就构成了第三个阶段。从与《花好月圆》那滔滔不绝如长江大河一般的叙述洪流相比较,李娃前半生三次关键性人生转折的被动性,同样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所隐喻说明的,是李娃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面对现代历史潮流时因为主体性的难以建立而只能万般无奈地随波逐流。从这个角度来说,李亚在《花好月圆》中对现代历史一种不无独到意味的发现与领悟,恐怕就是强烈地意识到了主体的羸弱,也即在强大历史洪流面前,普通个体主体性的无法确立。

然而,主体的羸弱与主体性的无法确立,却并不就意味着存在的一片虚无。我们可以在《花好月圆》中发现某种珍贵感情的存在。这深厚而浓烈异常的感情,既可以落实到大爷爷李娃与大小姐身上,也可以落实到李娃与祝长官之间。不只是李娃追随大小姐转投新四军参加革命,是一种感情的结果,而且,即使到最后大小姐准备出国的时候,也仍然坚持要来看李娃一面,充分彰显出了李娃和大小姐这两位有情人彼此之间的深厚情愫。李亚借助于李娃所凸显出的,乃是一种极其难能可贵的人性情怀。更进一步说,也正是凭借着这种强烈执著的感情描写,李亚的这部《花好月圆》方才抵达了一种更具超越性的生命与艺术境界。

《花好月圆》李亚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特别推荐



重拾生命中的美好和感动

刘小兵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是著名作家余华的全新杂文集。书中,余华谈自我成长,述与文学的渊源,道游历世界的见闻,抒与笔下人物和海外农民的思想交集……以深刻的洞察,探究着人性的宽广与丰富,揭示着文字背后博大的感召之力。

此书是余华文学之路上的小结,也是对关心自己的读者所作出的一种情感上的呼应。他畅意地谈文学、谈现实、谈写作、谈艺术、谈往事,感情真挚,语句幽默朴实。探讨文学写作的同时,还引发出诸多人性的思考。从默默无闻在小镇当牙医,到面对熙熙攘攘的人流,发出不甘于命运摆布的诘问;从处女作《星星》在《北京文学》发表,到感动于编辑与作家之间真诚无私的交往;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奠定“先锋派”作家地位,到对笔下人物灵魂世界的深度剖析;从走出国门感受异域风情,到面对中外读者,妙释写作中的疑难杂症。一路走来,余华努力找寻着文学和人性中的契合点。正是从与《北京文学》《收获》《钟山》等杂志的文学编辑热忱交往中,他体会到文学不但能带给人精神上的快乐,还真切感知到“以文为媒”的背后,所散发出的至真至纯的人性之美。从笔耕不辍写出自己的忧伤和快乐,到静下心来,认真推敲文章中的意境和深刻指向,余华在孜孜不倦书写青春和迷茫之时,也逐步把视角转向对现实的用力描摹。随着岁月的推移,他对生命的理解日益充盈,终于促使他一发而不可收,相继推出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样紧扣时代背景,深深触及读者心灵的现实力作。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既是个人的文学“大事记”,也是一个思想者用文字记录的方式,用“文学”之镜观照世界所发出的生命箴言。至于这本杂文集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颇让人思量的书名,一切源于余华2010年5月参加耶路

撒冷国际文学节期间参观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经历。二战期间,一名波兰农民冒着生命危险,将一个素不相识的犹太人藏在了家中的地窖里,因而救了那人一命。有人问这位波兰农民,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犹太人,他说:“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个温情的小故事深深地震撼了余华,在他看来,这个勇敢的行为意味着人性的力量:“文学包罗万象,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人。”

值得称道的是,这么多年来,余华的创作轨迹一直在围绕着“人是什么”这一永恒的主题,不断开掘、剖析和呈现着那些生命中的美好和感动。书中,余华直言不讳地与读者分享了自己对生命有常和无常的理解,试图从文学层面去探讨其广泛的社会意义。此外,他还结合对鲁迅、莎士比亚作品的解读,多方地展示了生命的丰富内涵。印象最深的是,余华在《活着》中有一段对月光的描写,就渗透了他对平凡生命的独到感悟。“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如此精妙的刻画,取代了几页纸的长吁短叹,把富贵对儿子有庆的思念,对生命过往中的那些美好,渲染得极其感人。于无声处听惊雷中,写尽了多少人性中的沧桑和悠远!书中,类似这样简约的描写俯拾皆是。如果缺少了对“人是什么”的深刻理解,是断然写不出这样意味隽永的语句的。

阖上书卷,余华以重拾生命中的那些美好和感动,给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震撼。其实,这个多元的社会何尝不是一本意蕴深邃的书?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践行,在这本大书中书写着自己的历史。秉持着一份美好和感动,就会以言胜于行的人生实践,为“人是什么”这一哲学命题,添上一份惊艳和美丽。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余华 著 译林出版社出版

好书导读

细节就是天堂



喻剑平

法国大画家莫奈说过:“天堂就在细节中。”

两个素不相识的孩子在医院偶遇,而后在走廊上笑着追来赶去。他们无疑是快乐的。默默地望着,“不打扰”他们快乐的老爸目光是充满爱意的;一声断喝把孩子们快乐生生打断的老妈,不能说她暴喝的声音里没有爱。

这样的细节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在熊小平“熊爸带崽记”《爱与快乐不可替代》一书中还有很多。比如“如早晨起来尿尿,抱着他回房间的时候,他眼睛都还没有睁开,却打着‘左拐’‘右拐’‘直行’手势指挥我前进。”“拿个放大镜,找大洲大洋,找钓鱼岛找台湾岛……我去过的城市找老家的位置。看得舍不得睡觉,还要问:‘爸爸,下次去买个宇宙地图吧。’”这些熟悉的细节,让读者还原出一个车迷、地图迷小孩生动可爱的形象。

孩子们所迷恋的世界是他们的天堂,他们的天堂由具体的一言一行,由众多的我们耳熟能详的“细节”链构而成。他们的天堂以快乐为原则,这些快乐其实很简单,并不需要大人们过多参与,只需你默默地欣赏就足够了。而对于大人们来说,爱就是天堂。我们想方设法向孩子去“示爱”,甚至构造很多“细节”去表达,但无论父母与孩子关系如何融洽,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所以在向孩子示爱的过程中,如何参与或者叫正确干预,真是一个伤透多少父母脑筋的课题。而《爱与快乐不可替代》一书,应当有很多的“细节”给了我们以有益启示。比如为不让孩子丢失“一旦大人不能牵着小孩的时候,必须让他走在前面,因为小孩视野窄”;又比如小孩吃饭不愿分享好菜时“我迅速把筷子调头,用粗的那一端朝一欧的手敲去。小时候,我吃饭不扶碗,也被父亲这么敲过,记忆犹新,当时就觉得好痛,痛到骨头里面去了。”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到底要不要暴力?“熊爸”不仅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是用了较大篇幅,展示了很多“细节”来回顾探讨,正因为此,这本书就比很多“秀恩爱”的所谓鸡汤类教子书籍来得真实也更有价值。有谁会否认父母偶尔的“暴力”里面就没有爱的成分呢?

有朋友曾问我《爱与快乐不可替代》到底是一本文学著作,还是一本教育心得?我想了很久之后这样回答:“这有区别吗?我写我心事,天下之至文。”与孩子一起成长,虽然这成长不一定完美,但绝对真实;虽然每个人的“带崽记”不一定文辞华美,但能记下来绝对就是至文。因为每个人的成长只有一次,所有的“细节”只有一次,错过一次,不可重来。相对于爱与快乐,其余的都是虚华。

很欣赏《爱与快乐不可替代》中的一句话:“快乐真的是一种能力啊,可惜很多人和我一样最开始有,后来竟然慢慢失去了或者减弱了这种能力”。愿天下所有的大人都尽量不要失去爱与快乐的能力。

《爱与快乐不可替代》熊小平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走马观书

《半夏河》

申赋渔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继《匠人》后再思故乡风土人事,追索生命的来处。25段往日故事,串连起对中国乡村传统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的珍贵记忆,意在表达“人需要靠着记忆的美好来对抗粗糙的现实、焦灼的心绪和纠结的情感”。

《一个女兵的悄悄话》

严歌苓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通过女主人公陶小童的内心独白,真诚地展示了一个淳朴而聪慧的少女的人生遭际。作者在自述中自省,敏锐的感觉与细腻的笔触相得益彰,苦涩的纪实与幽默的自嘲相互映衬,作品在轻松之中别具深刻启人的内力。

《家门口的四季》

康素爱萝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以恬淡清新的笔调,记录了住在城市里的普通人,对身边一年四季草木风物的认知与感悟。在对那些久已不再留意的时令变化、树木花草、鸟虫果蔬的细节描述中,重拾简单朴素的生活乐趣与小小惊喜。

潇湘诗情

与“诗魔”洛夫的 四次见面

董正宇

“诗魔”洛夫是湖南衡阳人,为笔者乡党。先生“乡愁”浓郁,先后八次回乡探亲。笔者当时在南华大学法学院执教,从事的又是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科研工作,与先生前后有四次见面与交往。时间的魔力让人遗忘了许多往事,但生命中那些亮点,往往能冲破时间成为永恒。当然,记忆也需要时时打捞,才能把若干碎片沥干,组成较为完整的记忆链条。对笔者而言,与“诗魔”洛夫先生难忘的面缘就属于此种情形。

首次见面是2007年10月30日中午,地点为衡阳市区回雁峰旁边旺鸣轩酒楼。先生虽年近八旬,但一身玄装,腰板笔挺,谈吐儒雅,精气神十足。尤其是摘下帽子后,一头银发,白雪飘飘,给人印象深刻。先生夫人陈琼芳女士也是首度得见,举止得体,言辞亲和,一看就是大家闺秀出身。夫妻两人感情深厚,洛夫先生曾有多首诗歌专为夫人而作。

再度相逢是两年后的10月24日,先生家乡衡南县举办盛大的“中国·衡阳云集洛夫国际诗歌节”,在海内外千万双眼睛见证下,洛夫先生与衡南县人民政府签订协议,将个人诗文稿、出版物、书艺作品及图片资料,全部无偿赠予对方,用于修建洛夫文学馆,同时为洛夫文化广场奠基培土。

诗歌节期间,还有一项重要的活动——电视专题访谈,我出任访谈嘉宾。那天下午,访谈在衡南电视台演播厅举行,采取问答方式,前后近一个小时。可能是回到家乡的缘故,先生十分兴奋,表达欲望强烈,凡问必答,滔滔不绝。结束前还邀请夫人登台,当场朗诵昔年写给夫人的得意诗作《因为风的缘故》。先生乡音未改,以一口杂有衡阳口音的国语朗诵,的确别有一番风味。此次访谈大获好评,也使我对于洛夫先生博大精深的诗歌世界,有了一个全新认识,奠定了今后数年开始全方位系统研究洛夫诗歌的基础。

三天后的下午,我第三次得见洛夫先生。衡阳市作协举办一场“诗魔洛夫接风茶话会”。一个不满10岁的小女孩,朗诵自己写的一首献

给洛夫爷爷的诗,把气氛推向了高潮。也许是刚刚经历诗歌节连场活动的奔波,洛夫先生略显疲倦,但发言时仍然十分认真,按照事先准备的手写发言稿做了答谢,言语不多,但心情一直很好,对合影者几乎来者不拒。

第四次相见是2011年秋天,洛夫先生偕夫人回到衡阳,专程为南华大学成立的“洛夫与湘南作家研究中心”而来。

我和罗玉成教授为该研究中心的首倡者。之前的6月15日,由我执笔,两人就中心成立相关事宜联名致信先生,提出三项请求:一是邀请他出席研究中心的揭牌仪式,并做一场学术讲座;二是请他挥毫题赠“洛夫与湘南作家研究中心”牌匾;三是希望先生支持,赠予洛夫诗歌有关研究资料。先生7月16日回信说,由于加拿大邮局员工罢工,信件一个月后才送达。他对三项请求都作出了肯定答复,积极支持成立研究中心,并郑重地用横竖两种方式书写了中心牌匾。10月22日,揭牌仪式在南华大学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如期举行,洛夫先生现场向中心赠送了自己的诗集和相关访谈、评论集,并作了题为《感受诗歌之美》的专题学术报告,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此后经年,先生虽然还有回乡之旅,由于我的工作岗位异动,未能再次与先生相见。转眼到了去冬今春,不断有消息传来,余光中等台湾文化名人,如同道旁樟树落叶纷纷随风而去。3月19日更有噩耗传来,先生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病逝,享年90岁。接下来三四月交接的数天内,我的岳母和母亲两位长者相继驾鹤西归。因为风的缘故,这个春天注定是一个忧伤的告别季。

先生有名诗《烟之外》,其中两句最为经典:“在涛声中呼唤你的名字而你的名字/已在千帆之外”。岁月匆匆,与先生有如上四度短暂交往经历,弥足珍贵。

值得补记的是,虽有断续,但经过多年累积,笔者研究先生及其诗歌世界的专著《走近诗魔洛夫》,到今日终有所成,不枉9年前对先生进行访谈时作出的庄严承诺,更可以视为对先生和亲人们远逝的最好怀念。